

THE ENLIGHTENMENT & THE BOOK :

SCOTTISH AUTHORS & THEIR PUBLISH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IRELAND & AMERICA

[美] 理查德·B·谢尔 (RICHARD B. SHER) 著
启蒙编译所 译

启蒙与出版：

苏格兰作家和
18世纪英国、爱尔兰、
美国的出版商

上册

THE ENLIGHTENMENT & THE BOOK :

SCOTTISH AUTHORS & THEIR PUBLISHERS IN
EIGHTEENTH-CENTURY BRITAIN, IRELAND & AMERICA

启蒙与出版：

苏格兰作家和
18世纪英国、爱尔兰、
美国的出版商

上册

[美] 理查德 B·谢尔 (RICHARD B. SHER) 著

启蒙编译所 译

 复旦大学出版社

平装本序言

《启蒙与出版》一书问世后，广受欢迎和好评，令人非常高兴。与此同时，也发现了书中存在的许多错误，促使我虚心反省。我十分感谢朋友、同事和读者的评论，让我注意到这些错误，也感谢编辑允许我在平装版前面添加一段序言。

威廉·波斯维克·约翰斯顿(William Borthwick Johnstone)绘制过一幅詹姆斯·希巴德(James Sibbald)流通租借图书馆内部的虚构图画(现在保存于爱丁堡作家博物馆)，看上去仿佛再现了18世纪80年代的情景，以致我没有怀疑那些识别画中人物的标志就将它复制到了书中。可是伊恩·辛普森·罗斯(Ian Simpson Ross)提醒我，背景里左起第二个人物(就像书的封面上复制的那样)实际上是亚当·斯密(与詹姆斯·塔西[James Tassie]为他绘制的著名圆形肖像画一模一样)，画面底部的小字却把他标注成了蒙博多(Monboddo)勋爵；其实画面最右边的人物才是蒙博多，而不是亚当·弗格森(Adam Ferguson)。伊安·戈登·布朗(Iain Gordon Brown)也证实了这个说法，参见他在《出版季刊》第25期(2008年9月，第333—335页)中对我的书的评论。经过查证之后，我得出了

相同的结论。因此,应该用同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人物的亚当(斯密)代替另一个亚当(弗格森)。

在作者说明的章节中,关于货币和汇率的内容我主要采用了约翰·麦考斯科(John McCusker)的数据,他是18世纪英国与美国的货币兑换方面的著名权威学者。这次为了出版平装本,他帮助修正了本书中出现的几个货币汇率数据。如第4页,1791年时的一个标准英镑在美国相当于4.44美元,而不是4.55美元。本书出版的2006年,一个标准英镑的购买力应该相当于1746—1770年间的105英镑或192美元,在18世纪七八十年代相当于85英镑或154美元。在作者说明的末尾,提到约翰·侯姆(John Home)的剧本《阿尔弗雷德:一个悲剧》的例子时说,原价的一个半先令大约相当于2006年的6英镑,这个地方应该更正为6.4英镑。当然,尝试将18世纪的英镑转换成20世纪末至21世纪初的货币等价物时,只是根据当代的购买力进行粗略估算,因而随着判断标准的不同会有相当大的变化;举例来说,在描写约翰·亨特(John Hunter)的作品《外科医生》(*the Knife Man*, 2005年)中,温蒂·穆尔(Wendy Moore)使用了英格兰银行的零售价格指数作为转换标准,结果得出了明显更低的兑换比率。

推出了精装版本之后,我才注意到遗漏了表一中的作者的一些作品,本来应该把它们加入表二即苏格兰启蒙运动作品的数据库(两个表格都出现在索引中)。其中包括乔治·查尔默斯(George Chalmers)的两部关于美洲殖民地的未完成作品:《当前联合殖民地的政治记录,从定居至1763年的和平时期》第一册(伦敦,1780年出版)和《殖民地解放史导论》第一卷(伦敦,1782年出版)。有一部作品本来可能作为托马斯·布莱克洛克(Thomas Blacklock)的遗作入选:《劝勉(paraclesis),或从自然及揭示出的宗教信仰演绎的安慰》。两篇专题论文:其一的作者据推测是西塞罗,现已译成英文,其二是托马斯·布莱克洛克神学荣誉博士的原作(爱丁堡,1767年

出版)。该书的题词是献给詹姆斯·比蒂(James Beattie)的,在讨论作者之间互相交换题词时(第141—142页),原本可以引用这段内容。另一部值得加入的作品是《慈善事业:以期刊论文的方式》(伦敦,1797年出版),那是一部匿名作品,根据1798年6月2日威廉·理查德森(William Richardson)写给安德鲁·斯特拉恩(Andrew Strahan)的信件(保存于约翰·尼科尔斯(John Nichols)档案馆,感谢朱利安·普利(Julian Pooley)提醒我注意到它),现在可以确认其作者是理查德森。该书里面包含了进一步的证据,表明理查德森热衷于匿名出版(如本书153—154页讨论的),还有一个有趣的段落谈到了作者的“各种伪装”。相反,安德鲁·阿什菲尔德(Andrew Ashfield)告诉我,《自然和艺术作品中的基本美学原则探究》(表二中的no. 347,在381页引用)一书不应该被加入作品数据库,因为版权页上显示的作者威廉·汤普森(William Thomson)不是表一中的那位苏格兰的多面手作家(英文短标题目录是这样记载的),而是同名同姓的都柏林艺术家,其生卒年份为1726—1798,而不是1746—1817。这个错误告诫研究出版历史的学者,必须去核查书籍的原文。由于数据库里的个别作品极其稀有,我未能做到全部查对,不过这个错误是找不到借口的,因为只要稍微看一下该书前面的传记性回忆录,就可以识别出作者的正确身份。

本书第12页评论说,1934年普瑟伍德·史密斯(Preserved Smith)的一部作品“可能是首先在题目中使用‘启蒙运动’这一术语的书”。但是詹姆斯·施密特(James Schmidt)向我指出,这个先驱的荣誉实际上属于约翰·格里尔·希本(John Grier Hibben)1910年的作品《启蒙运动的哲学》。我在167页叙述,根据我的数据库,在作品卷首使用作者肖像画的例子最早出现于1763年,那是托比亚斯·斯摩莱特(Tobias Smollett)的《续英格兰全史》(表二,no. 67)推出第二版时,由方济各·阿利亚梅(François Aliamet)雕版制成的



卷首插画肖像。在我能够查明的范围内,这个结论在作者、作品标题和画家方面都是正确的,但是根据詹姆斯·梅(James May)的记录,1760年斯摩莱特的《续英格兰全史》首次出版时,已经使用了这幅卷首插画肖像。类似地,罗伯特·弗格森的诗集在1799年出版时含有一幅卷首插画肖像(如191页的记述和171页的注释),但是罗伯特·莫里森(Robert Morison)和佩斯(Perth)的儿子在1788—1789年出版该书时已经使用过这幅肖像,而且质量要好得多。

关于《启蒙与出版》的印刷错误,我已经在网站上(<http://long18th.wordpress.com/>,2009年11月15日)掲載了更正的内容,用于回应大卫·玛泽拉(David Mazella)和埃莉诺·谢芙林(Eleanor Shevlin)在2009年10月整理的电子版“辅助读物”。各位读者如果发现其他错误,可以在我在网站上发布的文章后面以评论的形式提出,我将十分感谢。

读者们对《启蒙与出版》的热烈反响鼓励我相信,对于研究书籍出版、启蒙运动以及18世纪后半叶大西洋两岸英语国家历史的学生和学者,本书都是有价值的参考资料。我希望,平装版本可以让更多的读者接触到这部作品,让他们通过独特的表述方式,体会到苏格兰启蒙运动作品的创作和传播过程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上的最早和最好的人类历史”。本书强调在启蒙运动思想和价值观的产生和传播过程中,出版文化发挥了重要作用,并试图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作品理解为作者与出版业工作者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的产物,不仅在苏格兰,而且在英格兰、爱尔兰和美国同样如此。

R. B. S., 2010年1月

前言

FOREWORD

关于“出版”这个词的定义，我最欣赏塞缪尔·约翰逊(Samuel Johnson)1755年所编写的著名词典中的解释：“向世间推广一本书。”当然，在这里使用“书”这个词可能有些局限性，因为杂志、报纸、手册同样也是被印刷出版的。不过我们要讨论的是关于书籍的出版。出版行业曾经被认为只是单纯地承担印刷和流通的任务，约翰逊的定义让我们注意到出版这一媒介在18世纪所起的重大作用，并且暗示了书籍出版的广延性质。依照上述观点，约翰逊为出版者这个词作了类似的定义——“将一本书推荐给世间的人”，也就是面向全世界的文化传播者。所有人都知道每本新书都需要一位作者，因此约翰逊在词典中将作者定义为“任何著述的第一位著者”（与翻译或编者相对），或是“一位原创作家”，这恰恰是由于约翰逊本人是一位职业作家。他受到伦敦出版文化环境的深深浸染和熏陶，了解从作家或文本制作成书籍到销售的过程十分复杂、富有创造性而且充满了各种可能，出版者在这一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在18世纪后半叶苏格兰的启蒙运动中，书籍是怎样被推广到



全世界的，这正是本书要探讨的主题。尽管可能显得冗长，而且有少量专业技术词汇，本书是为一般读者而写的，因此包含了一部分关于书籍史和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基础知识，希望相关领域的专家们能谅解。

在之前一本书《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教会与大学》里，我定位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制度与意识形态的核心，那是温和的长老派牧师和爱丁堡的大学教师组成的团体。一个稳健、不极端的古老教派和一所杰出的大学，其领导人都是历史古都爱丁堡声望卓著的教士和学者，这非常有助于形成一个开明的环境，促进了思想文化在全苏格兰的传播，甚至在一些所谓“现代学者”不能单凭个人作出重大贡献的领域也极好地激发了知识分子的活力，例如科学、医学和法律。在爱丁堡及苏格兰的其他城镇，还有一些因素也刺激了知识分子与文化生活，包括充满活力的俱乐部和学术团体、不断增加的资助以及丰富的知识遗产。这些因素鼓舞了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先驱者们——教师、传道者、法学家、医生和实验科学家认识到自己的潜在才能，然而即便如此，当他们表达自己思想的时候，首先还是需要依靠著述，尤其是通过出版书籍来获得机会，以便为自身和他们的祖国赢得声望。因此在苏格兰启蒙运动中，出版业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

在本书的全部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受益于许多友人和同行的协助。首先要感谢的是比尔·扎克斯，他提供了很多有价值的指导，还让我借阅他图书馆中的藏书和手稿。沃伦·麦克道格尔和斯蒂芬·布朗也给了我极大的帮助。杰夫·斯密顿，尤其是保罗·伍德给全部书稿提出了启发性的参考意见。多丽丝·谢尔协助了最终定稿。亚当·布德对第一和第二部分、詹姆斯·拉文对第四和第五部分提供了有价值的评论。此外戴维·艾伦、休·阿莫瑞、芭芭拉·本尼迪克特、马克·博克斯、斯蒂芬·布朗、詹姆斯·格林、瑞

安·汉利、安德鲁·霍克、玛丽·肯尼迪、萨拉·诺特和菲奥娜·斯坦福德也阅读和评论了一些特定的章节和部分。费城图书馆的吉姆·格林是我在早期美国书籍出版文化方面最主要的导师，我很感激他和罗莎琳德·莱默的帮助。很多人在这本书的写作提供了资料，如鲍勃·阿内尔、尼格尔·阿斯顿、麦克·巴夫特、汤姆·波内尔、斯基普·布拉克、菲利普·卡特、凯瑟琳·迪尔、罗杰·爱默生、简·法格、唐纳德·法伦、亨利·福尔顿、凯瑟琳·琼斯、弗兰克·卡夫卡尔、托尼·刘易斯、凯特·马斯特斯、哈密什·马蒂森、伊恩·马克斯特、卡罗尔·麦克格里克、马丁·莫内、玛丽·凯瑟琳·莫兰、约翰·莫里斯、戴维·费特·诺顿、约翰·罗伯逊、菲利普·罗斯奈、西尔维亚·塞巴斯蒂安妮、杰夫·斯密顿、马克·斯宾塞、珊迪·斯图尔特，还有伊安·怀特，在此一并致谢。也许会有人提出，在英语文化圈，书籍史作为一门成熟的历史学科，其划时代的标志是在1979年几乎同时出版的罗伯特·达恩顿(Robert Darnton)所著的《启蒙运动的生意》与伊丽莎白·L·爱森斯坦(Elizabeth L. Eisenstein)所著的《作为变革动因的印刷机》。我的确非常珍视这两位知名学者的作品给我的众多鼓舞和启示。

有些学者和朋友为本书的写作出过力，却在它完成之前不幸去世了，现在特别用一整个段落来献给他们，这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通过书商安德鲁·米勒，我与休·阿莫瑞的合作非常密切，以至于论起贡献来，我们都分不清楚应该谁先谁后，不过我可以确信，我是从中得益最多的一个。英国出版行业协会由彼得·艾萨克(以及现在还活跃着的巴瑞·麦科凯)组织的年度学术研讨会让我有机会参观现场，有益于我对米勒和威廉·巴肯的研究，使我得以在广阔的英国背景下形成关于作者和出版者的看法。感谢柯林·马修给我机会，让我作为作者兼助理编辑参与那部伟大的《牛津国家传记辞典》的编撰工作。在那几年中，我掌握了有关那些出

现在本书中的作者和出版者的大量有价值的传记知识。罗杰·罗宾逊是研究詹姆斯·比蒂(James Beattie)的生平和诗作的首席专家,对研究比蒂与他的出版者的关系提供了巨大帮助。文森特·基纳尼提醒我,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有格莱斯伯利分类账的保存,在那里我发现了将都柏林图书销售公司的成员分类识别的意义。玛丽(保罗)·波拉德[Mary(Paul) Pollard]一直是我灵感的来源,就和她带给从事爱尔兰书籍史研究的许多同行们的灵感一样。1999年7月,我和她第一次在大主教图书馆(Marsh's Library)见面,我想那是在都柏林的研究经历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在造访卫康医学史研究所(the Wellcome Institute for the History of Medicine)的时候,我很荣幸地和罗伊·波特(Roy Porter)共同讨论了我工作的部分内容,真希望他现在仍在这里,就我们对启蒙运动的分歧进行辩论,分享他关于18世纪的广博学识。

虽然在90年代早期我就着手准备写作这本书,但正式的研究工作在1994—1995年从约翰·西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John Simon Guggenheim Memorial Foundation)得到一笔十分值得感谢的研究基金之后才开始。在2001—2002年的第二个公休假期期间,这项工作有了重大的进展。1998—1999年,在那两年的细致研究和写作过程中,我幸运地从斯宾塞基金会(Spencer Foundation)得到了一笔研究津贴。同样很感谢国家人文科学基金会于1994年所发放的夏季研究基金。感谢霍华德·伽斯基尔1998年安排我作为访问学者在爱丁堡大学度过了一个夏天。以及在1999年7月,由安德鲁·卡彭特安排我作为访问学者访问了都柏林大学。还有2000年7月,我在爱丁堡大学书籍历史中心做了一个月的临时研究员,为此我要向比尔·贝尔致谢。

很多作者在成为学者的道路上会从图书馆、档案馆以及他人那里获得许多帮助,对我而言,这种情况尤为明显,因为这本书的写作

十分依赖于珍稀书籍和未经出版的手稿。这本书中主要涉及四座城市，很自然，我的绝大部分研究时间是花费在这四座城市的图书馆和档案馆里。我很幸运，能够在大英图书馆的新馆和旧馆度过三个夏天，写完重要的部分。我还造访了英国文书厅（Stationer's Hall）和卫康医学史研究所的图书馆。在爱丁堡，无与伦比的苏格兰国家图书馆是我研究活动的基石。不过我也大量获益于爱丁堡大学图书馆、苏格兰国家档案馆、爱丁堡城市档案馆、爱丁堡皇家医学院的图书馆、苏格兰系谱学会，以及爱丁堡中心图书馆那绝妙的爱丁堡室。在都柏林，我多次使用了爱尔兰国家图书馆，还有都柏林三一学院和都柏林综合大学的图书馆。在爱尔兰皇家学院、爱尔兰皇家内科医学院、爱尔兰皇家外科医学院以及大主教图书馆和都柏林公共图书馆中，我也度过了一些有意义的时间。我还到费城的美国哲学家协会、图书馆协会和宾夕法尼亚的历史学家协会做了多次有价值的拜访。

2000年，在多伦多大学的托马斯·费舍尔珍本图书馆，我很高兴能与保罗·伍德还有其他同事合作，组织了一个题为“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书籍文化”的展览会。对18世纪英国书籍的研究者来说，那里是全球最好的图书馆之一，给了我极大的帮助。非常感谢耶鲁大学善本图书馆（Beinecke Library）的斯蒂芬·帕克斯，同样还要感谢耶鲁的包斯威尔办公室的戈登·敦布尔、吉姆·考德尔等人。在哈佛大学的霍顿图书馆，刘易斯·莫里斯和里克·斯泰勒放下自己的工作来帮助我，当时我的工作正处于关键时刻，需要查阅查尔斯·海德和玛丽·海德传道会18世纪未完成的手稿。为写作本书，我还造访了许多其他的图书馆，我很乐意在这里提及它们。例如在英格兰，有雷丁大学图书馆、牛津大学图书馆、约翰·莱兰德图书馆、纽卡斯尔的文学和哲学研究学会。苏格兰的格拉斯哥大学图书馆、米切尔图书馆、圣安德鲁斯大学图书馆，以及阿伯丁大学图

书馆。美国的国会图书馆、皮尔彭特·摩根图书馆和国立医学图书馆，还有加拿大蒙特利尔的麦基尔大学图书馆。在我家周边的地区，有数不清的日子，我在纽约公共图书馆、普林斯顿大学的火石图书馆和罗格斯大学的亚历山大图书馆度过。新泽西科技学会的范荷顿图书馆有一个馆际借阅办公室，感谢他们有效率的工作，每次总能回应我的请求，使我在异地也能不断借阅冷僻的资料。

对本书中提及的拥有原稿资料和珍稀版本的图书馆及其职员，在此一并表示感谢。有些图书馆由于我无法前去造访，就为我提供了原稿资料的复印件，其中密歇根大学的威廉·L·克莱门特图书馆提供的威廉·扬(William Young)论文集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威廉·扬原稿的缩微胶片是借自马萨诸塞州沃彻斯特的美国古文物收藏家协会，扬的家族史料是借自特拉华州的历史学家协会，托马斯·卡德尔(Thomas Cadell)论文集是来自杜克大学图书馆。在个人的收藏家中，我要感谢阿德布莱尔家族的布莱尔·奥利芬特，允许我引用威廉·克里奇(William Creech)的书信集，我是通过苏格兰国家档案馆保存的缩微胶片副本查找到它的线索的。感谢弗吉尼亚·莫瑞允许我引用约翰·莫瑞(John Murray)档案馆中的信件(曾经为伦敦的约翰·莫瑞有限公司所有，但是现存于苏格兰国家图书馆)，比尔·扎克斯和沃伦·麦克道格尔有时为我提供一些抄本，查尔斯·麦科诺奇·维尔伍德允许我引用艾伦·麦科诺奇(Allan Maconochie)的书信，米德班克勋爵允许我使用爱丁堡大学图书馆特别藏品部的缩微胶片。我很感谢总编辑戈登·敦布尔允许我引用耶鲁大学的包斯威尔论文集，还有耶鲁出版社的詹姆斯·包斯威尔(James Boswell)个人论文集编委会的成员们。感谢戴维·柯里允许我查阅卡农门街基尔温宁的共济会二号分会的原稿书卷，还有约翰·基伦允许我查找贝尔法斯特的莱能大厅图书馆收藏的18世纪书籍。

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多次上网查询了必不可少的英文短标题分类目录(ESTC),感谢罗格斯大学编写这份目录,可以说如果没有它本书就无法完成。另外还有罗格斯大学纽瓦克分校(Rutgers — Newark)的联合历史学部以及新泽西科技协会。我尤其要感谢参与那个项目的众多优秀学生们,他们参加了我的不同版本的研究生课程:文化比较学、英国知识和文化历史以及通信和技术的社会历史。在那些学生中,我特别要感谢斯蒂芬·帕特诺德,他在本书研究的早期阶段提供了帮助。新泽西理工学院(NJIT)的乔伊斯·戴维斯和伊林·波利也提供了有价值的协助。

为配合文字,本书还附有一些插图,包括书中描写到的一些作者和出版者们的肖像,他们出现在书店、流通租借图书馆中,还有相关的机构,其中的大多数从未在现代出版的书籍中出现过。有许多人帮助我得到这些画像,尤其要感谢弗瑞迪·安德鲁斯、伊安·戈登·布朗、洛伊斯·丹斯基-沃尔夫、凯文·古米尼、帕翠斯·卡奈、苏·吉洛兰、莫瑞·莱博、凯特·玛斯特斯、罗宾·麦尔斯、安东尼·里夫、艾里森·罗赛、菲利普·维莫斯科奇,其中多伦多大学托马斯·费舍尔珍本图书馆的菲利普·奥德菲尔德提供的画像数量是最多的。特别感谢爱丁堡书商协会的 W. F. 鲍尔梅斯特,允许我复制詹姆斯·希巴德(James Sibbald)流通租借图书馆保存的威廉·波斯维克·约翰斯顿(William Borthwick Johnstone)的精美油画。

在芝加哥大学出版社,那位传奇性的人物道格拉斯·米切尔立刻明白了我想要做的事情,并且鼓励我继续写作。道格拉斯的同事罗伯特·戴文斯和蒂姆·麦克戈温也为本书出了力。这项工作得以更进一步要归功于文字编辑卡瑟琳·戈尔。这本书篇幅长、内容复杂,完成它需要许多人的支持和巨大的努力。深深感谢新泽西理工学院(NJIT)理科和文科学院院长法蒂·迪科,他慷慨地帮助



了我。

在过去 20 年间,18 世纪苏格兰的学术团体是我的专业研究的中心部分。即使由于我在这项研究上花费了太多时间,导致这本书出版的时间推迟了数年,我也不觉得遗憾。我在 18 世纪苏格兰研究协会(ECSSS)会议上详细听取的一些故事,也被用到本书中,会议成员们的友情和协作一直是我的宝贵资源和动力。特别是社团的各位主席——罗杰·爱默生、安德鲁·霍克、内德·兰兹曼、苏珊·曼宁、詹姆斯·穆尔、尼古拉斯·菲利普森、简·伦戴尔、约翰·罗伯逊、伊安·辛普森·罗斯和 M. A. 斯图尔特,他们以各自的方式支持了本书的写作和我的生活,感谢他们每一个人。

在最后也是第一次,我要把本书献给我的妻子多丽丝,她与我共同生活了 30 多年,是我的伟大伴侣和最好的朋友。

结构

读者如果对本书的主题只有一般的兴趣,可能不愿意一边阅读正文一边查找相关的资料。而另一些读者——特别是学生和研究书籍史、启蒙运动或 18 世纪思想文化的学者,他们可能希望在阅读正文的同时随时能够参考相关的资料。也有一些读者可能希望将本书作为工具书使用,把注意力放在数据资料上,而只是选择性地阅读正文。

本书在结构上做了一些安排,为后面两类读者提供了便利的切入点,同时将带给第一类读者的困扰降低到最小限度。如同在第一章中解释的,本书的实证基础包括 115 位苏格兰作家信息(表一)的数据库,在 1746 年到 1800 年之间,他们出版了 360 本著作(表二)。正文中包含的所有插入引文标记,例如(no. 131)或(nos. 17 和 162),它们都与表二所列出的书籍标题的数字编号相对应。这些引文标记提供了快速链接,指向正文中讨论的书籍的进一步信息,不过,非专业读者可以选择忽略它们。读者如果希望查找表二中的资

料,可以通过表一列出的每位作者姓名(如果起点是某位特定的作者),或者表二附录的出版者索引的出版者姓名(如果起点是某位特定的出版者)之后的数字编号来进入相应的资料库。

术语

在 18 世纪,“出版者”(“publisher”)这个词有时会被用于指称从事出版印刷以及为书籍出版提供资金的人,但是更加常用的还是“书商”(“bookseller”)这个术语。本书中这两个词都会出现(有时甚至用“书商—出版者”(“bookseller-publisher”)),不过总体而言我比较喜欢使用“出版者”,因为这个词更加清晰地体现了书籍出版者和销售者的职能区别,而且它包含了从事印刷业的威廉和安德鲁·斯特拉恩(William and Andrew Strahan),尽管他们不是书商,却是那个时代出版者的重要代表。

按照当代的习惯,“版税”(“copy money”)这个术语(通常以连字符号连接)可以是指购买一份版权的价格,在一般的场合,它是指出版者为作品支付给作者的钱,无论是买下版权还是用作别的用途。本书采用第二种释义。

本书中的“重印”(“reprint”)这个术语是指一本书在前一次出版之后,重新按照模版印刷。“再版”(“reissue”)这个术语是指一本书重新出版,使用在较早版本中未被收录过的原稿,通常会更换新的标题封面,有时会对原版本加以修订或者添加新的内容。

拼写和标点符号

根据 18 世纪未出版的原稿,基本的缩写和缩略语在当时已经

被广泛使用,例如“wt.”是“with”、“wh.”是“which”、“Edinr.”是“Edinburgh”的缩写,就像“and”被标记成“&”。这一习惯在正式出版的书籍中未被沿袭,但是在表示固定搭档(如“卡德尔 & 戴维斯”)的短语中,为了防止混淆,在人名之间会使用“&”这个记号,例如“安德鲁·斯特拉恩和卡德尔 & 戴维斯(Cadell & Davies)出版”。

货币

在18世纪之前,英国的基本流通货币已经建立起了确定的兑换比率:

一先令(1s.) = 12便士(12d.)

一镑(£1) = 20先令(20s.)

一畿尼 = 21先令(21s. 或 £1.1s.)

然而在英格兰、苏格兰和爱尔兰,“镑”的实际价值是不同的。苏格兰镑的价值只是英镑(标准英国货币)的数分之一,在1707年英格兰和苏格兰的议会联盟建立之后,苏格兰镑就被正式地分离出来,虽然在18世纪,它还被用于支付苏格兰的房租、工资和农业产品。爱尔兰则一直使用爱尔兰镑,其价值大约比标准英镑低8%(1788年出版的格斯的《地理学、历史学和商业入门》中列出的货币表显示,爱尔兰的18先令5便士可以兑换标准货币1英镑,数据来自麦考斯科所著的《欧洲和美洲的货币与汇率》,第31—41页)。不过在本书中,英国和爱尔兰的书籍价格只根据在印刷厂公布的价格来给出,而不计入币值之间的差异。

在美洲的英国殖民者也使用镑作为通用货币,但是,每个殖民地都对当地的货币设定了不同的兑换比率。在费城殖民区,宾夕法尼亚先令的价值大约是英国先令的60%(宾夕法尼亚的一镑等于英国标准货币12先令)。一美元相当于一个西班牙银币(通称里亚